

DA173/0705

杨耀坤 著

中国魏晋南北朝宗教史

人民出版社

本卷提要

本书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发展史,起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终于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但在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失败后,遭到了统治者的打击禁止,失去了发展的良好机会。故在魏晋南北朝期间,道教虽也有较大的发展,但终不如佛教发展大。本书重点阐述其特点及发展经过。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却迅速发展起来。本书重点阐述其发展原因及发展过程。

目 录

中国魏晋南北朝宗教史

一、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	1
二、汉末魏晋时期道教的传播与分化	12
(一)巴蜀汉中五斗米道的传播与北迁	12
(二)天师道在北方的传播	14
(三)巴蜀地区天师道的继续传播	16
(四)江南民间道教的传播	18
1. 于君道与帛家道	18
2. 李家道与李弘起义	19
(五)道教在上层社会的发展	21
1. 东晋士族与道教	21
2. 杜子恭道团与孙恩、卢循起义	23
(六)葛洪及金丹道派的发展	25
(七)上清派的出现与灵宝派的形成	31
1. 上清派的出现	31
2. 《灵宝经》的出现与灵宝派的形成	33
三、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改革与发展	35
(一)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35
(二)陶弘景对道教的贡献	39
(三)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及天师道的衰落	44
(四)楼观道的兴起	50

四、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	54
(一) 汉末佛教流行的背景	54
(二) 牟子《理惑论》与佛教	55
(三) 三国时期的佛教	61
1. 曹魏佛教	61
2. 吴国佛教	65
3. 佛教在蜀汉的影响	70
五、西晋佛教	74
(一) 《般若经》之流行	74
(二) 佛经之翻译	75
1. 竺法护之译经	75
2. 帛远之译经	80
(三) 西晋的佛寺及佛教的流行概况	82
六、北方十六国的佛教	86
(一) 后赵佛教与佛图澄	86
(二) 前秦佛教与释道安	91
1. 道安的经历	91
2. 道安的佛教活动及成就	95
(三) 后秦佛教与鸠摩罗什	104
1. 鸠摩罗什的经历	105
2. 鸠摩罗什的译经	107
3. 佛陀耶舍等的译经	110
4. 鸠摩罗什的弟子与后秦僧官	111
(四) 北凉佛教与昙无讖	114
七、南方东晋的佛教	116
(一) 帝王、名士与佛教	116
1. 帝王与佛教	116
2. 达官名士与佛教	118

(二)般若学与六家七宗	127
(三)慧远与南方佛教中心	132
1. 慧远的经历	132
2. 南方的佛教中心庐山	133
3. 慧远的著作与思想	135
(四)法显之西行求法	141
(五)东晋佛寺与僧尼、僧官	147
八、南朝帝王士族与佛教	150
(一)刘宋帝王与佛教	150
(二)南齐帝王与佛教	154
(三)梁武帝与佛教	156
1. 梁武帝之提倡佛教	156
2. 梁武帝的佛教思想	162
(四)陈朝帝王与佛教	165
(五)南朝士族与佛教	166
九、南朝佛教	170
(一)竺道生与佛性顿悟说	170
(二)涅槃学与《成实论》的流行	175
(三)摄山《三论》学的兴盛与“二谛”义的讨论	179
(四)南朝之禅法与律学	182
(五)南朝之译经与佛教著述	184
1. 求那跋陀罗等之译经	184
2. 真谛之译经	186
3. 南朝重要的佛教著述	188
(六)南朝之佛寺与僧官	193
(七)南朝儒释道之争	196
1. 神灭与神不灭之争	196
2. 夷夏之争	198
3. “三破”之争	200

十、北朝帝王与佛教	202
(一)北魏帝王与佛教	202
1. 魏初二帝之崇佛	202
2. 魏太武帝之灭佛	203
3. 文成帝以后之崇佛	204
(二)北齐帝王与佛教	207
(三)北周帝王与佛教	209
1. 北周帝王之崇佛	209
2. 周武帝之灭佛	211
(四)北朝排斥佛教之儒士	214
十一、北朝佛教	217
(一)菩提流支等的译经及西行求经	217
(二)《十地经论》的传播与《阿毗昙》的盛行	219
1. 《十地经论》的传播	219
2. 《阿毗昙》的盛行	222
(三)禅法的盛行与律学的传播	223
1. 禅法的盛行	223
2. 律学的传播	227
(四)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的盛行	228
1. 弥勒信仰的盛行	228
2. 县离与弥陀信仰	229
3. 观世音信仰的流行	231
(五)北朝的寺院与僧官	233
1. 寺院与寺院经济	233
2. 僧侣与僧官机构	236
(六)北朝的石窟	238
1. 云冈石窟	238
2. 龙门石窟	241
十二、结 语	243

一、魏晋南北朝宗教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主要有道教和佛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的宗教，形成于东汉后期。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张鲁在汉中、巴蜀传播的天师道仍在传播。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有一套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张鲁在汉中就以五斗米道组织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建安中，曹操夺取汉中，将张鲁及其部分教民北迁，天师道因而在北方传播。但张鲁到北方后不久即去世，天师道因而组织涣散。在巴蜀的天师道也因无领导组织同样涣散。

成汉李氏据蜀后，因其信奉天师道，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当有较大的发展。

魏晋间北方战乱频繁，灾荒不断，人民群众便流入江南或巴蜀，而巴蜀民众也因此又流入江南。于是北方的太平道和巴蜀的五斗米道也传到江南。江南就出现了太平道的支派于君道、帛家道与五斗米道的支派李家道、清水道及杜子恭道团。这些道派都广泛在民间传播，后来还多次出现李弘起义与孙恩、卢循起义。

传入江南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民间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向上层发展。东晋时期信奉天师道的上族就明显增多，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义兴周氏等等，都有信奉天师道的。

东晋初，葛洪对以前的神仙思想作了总结，确立了神仙道教

理论体系,并发展了金丹派的炼丹术。葛洪认为,人可以通过修道而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而修道最主要的方法是宝精行气和服食还丹金液。故葛洪特重炼丹,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化学资料。葛洪的著作很多,现存而又最重要的是《抱朴子》。

东晋中叶以后,江南天师道盛行,出现了若干造作的道书,《上清经》和《灵宝经》就是其中的两类。《上清经》是杨羲、许谧所造,以后便发展为上清派。《灵宝经》是葛巢甫所造,以后发展为灵宝派。

南朝初期,陆修静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将早期民间道教改革发展为新的官方道教;并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分类整理了道教典籍,为道教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

南朝中期的陶弘景,在隐居茅山的45年中,广招徒众,弘传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核心基地,后世因称之为茅山宗。陶弘景除弘传上清经法外,还建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发展了养生修炼理论。陶弘景的著作很多,方面也广,主要的有《真诰》、《登真隐诀》、《养生延命录》等等。

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对天师道作了改革,改革的原则是“以礼度为首”,即以封建礼法制度为准则,凡符合的就保留和增加,不符合的就革除。经此改革后,天师道完全适合于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了统治者所用的官方道教。但是,北魏道教的发展终不如佛教,加之寇谦之之后又没有杰出的弘教者,新天师道便在魏末衰落了。北齐甚至不承认道教,北方道教只有北周关中地区兴起的楼观道在发展,并成了后世隋唐最兴盛的道派。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

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入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

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84部188卷。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

民族，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殊的感情。后赵石虎就曾说：“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坚持每年宣讲两遍，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著作。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在长安的最大一项佛事活动是组织译经。他在长安整6年中，直接主持译出佛经14部183卷。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

道安不仅是杰出的佛教学者，更是弘传佛教的大师。他徒众甚多，并主张“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在他即位后，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竟派兵西伐后凉。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姚兴即“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

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年中，译出大量佛经（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尚有39部313卷。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尤以《般若经》和“四论”（《大

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现代学者也说他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

鸠摩罗什还带了不少弟子,其中参加译经最得力者有道融、僧晷、僧睿、僧肇等等。僧肇还著有《般若无知论》等四论,后人收集成册,称为《肇论》。《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管理全国僧众,正职称僧主(即僧正),副职称悦众。在此稍前,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

北凉之佛教,以天竺僧昙无讫至凉州后最盛。昙无讫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槃经》、《方等大集经》等11部117卷。其中《大般涅槃经》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加之皇权衰弱,士族势盛,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如高僧竺道潜、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

东晋信奉佛教的士族名士还有撰写佛教著述的,如郗超撰写了《奉法要》、《明感论》、《全生论》等等,孙绰撰写了《道贤论》、《喻道论》等。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佛教的般若学依附于玄学,便出现了讲解佛经用玄学典籍的概念去比配佛学“事数”概念的“格义”现象,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便出现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不

同派别。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发展到后世,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

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慧远是成绩卓著的佛教学者和弘传大师。他撰写了不少著述,《高僧传》说他“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他的佛教思想也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方面有法性论、形尽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弥陀净土信仰、念佛三昧的禅学思想、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及佛儒调和论等。在弘扬佛学方面,慧远积极传播鸠摩罗什翻译的《三论》,使大乘中观学说在南方广泛流传,对隋唐三论宗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后期,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法显自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西度沙漠,越过葱岭,到了天竺各国。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回到青州长广郡,次年才到达建康,前后历时15年,带回了《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11部经律,并在建康翻译出大部分。这些经律都是深合当时需要的,《泥洹经》译出后,就引起了佛教界的变化。法显回国后撰著的《佛国记》,对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是研究五世纪初这些地区的重要资料。

南朝帝王崇信佛教的甚多,其中以宋文帝、梁武帝和齐竟陵

王萧子良最为典型。宋文帝既崇重佛教，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率土之滨皆纯此化（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时开西邸，即广招名僧讲说佛法，又举办斋仪，抄传佛经，撰写劝善文等。

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年，就下《舍事道法诏》，正式皈依佛教。此后，梁武帝就大力提倡佛教，通过一系列措施，几乎把佛教变为国教。其措施主要有：敬重僧侣、建寺造像、举办法会、布施舍身、禁断酒肉、讲经注经及著述等等。在现存梁武帝的著作中，还反映了他三教同源与神明成佛的佛教思想。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

在佛教理论的研讨与宣扬方面，晋末宋初起了变化，已从般若学转到了涅槃学。在这一转变中，竺道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法显译出 6 卷本《泥洹经》后，道生根据其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提出“一阐提人”（断灭善根的恶人）也有佛性皆得成佛说，立即遭到守旧派僧侣的反对，道生也因此被开除僧团。后来凉州昙无讖译的 40 卷本《大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果有“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说法，道生之说才被公认。自此，涅槃佛性说便广为传播。

竺道生还撰写了《二谛论》、《佛性当有论》、《维摩经义疏》等等著作，但他影响最大的学说还是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这两种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和学术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除盛行涅槃学外，还盛行《成实论》与《三论》学。南方《成实论》的传播，始于宋初至寿春的僧导。僧导弟子甚多，以《成实论》知名者有道猛、僧因、昙济等等。齐梁二代《成实论》学也相当盛行，齐代的僧柔、僧次，梁代的僧旻、法云、智藏，都是弘传《成实论》的大师。

南方《三论》学之兴盛较晚，梁武帝时辽东僧朗居于建康北面的摄山，弘传《三论》，后来因称为“摄山三论”，僧朗也被称为摄岭师。梁武帝曾遣智寂等十师前往受业。僧朗的弟子以僧诠最著名。僧诠的弟子又以法朗、智辨、慧勇、慧布四人最有名，时称为“四友”或“四公”。至陈代，慧勇于陈文帝天嘉中被请于太极殿讲经，自此声名大振。慧布仍在摄山，也受到陈代诸王之礼敬。法朗更为突出，于陈武帝永定初奉敕入京住皇兴寺，常讲《华严》、《大品》诸经及《三论》。弟子甚众，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隋唐时的吉藏就是其中之一。

南方之禅学不发达，至陈代中期，北方禅师慧思南下，进住南岳，弘传禅法，信众云集，南方禅学始盛。

南方弘传的律学是《十诵律》，律学家以刘宋的智称及齐梁的僧祐最著名。

南朝之译经，以宋代及梁陈之际所译最为可观。刘宋之译经，以天竺僧求那跋陀罗所译最多，译出 77 部 116 卷。其中有影响较大的《杂阿含经》与《楞伽经》等。梁陈之际的译经，以天竺僧真谛所译为主。真谛于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 548 年）入建康，正准备译经，侯景就进攻建康。后便颠沛流离于东南各地，但真谛并未停止译经和讲经，至陈宣帝太建初，共译佛典 26 部 87 卷。真谛所译经论，以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为主，如《摄大乘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等等。真谛译经边译边讲，其弟子记录下来便成义疏，这就是真谛的著作，数量也不少。

真谛所传瑜伽行派学说，在当时影响还不大。至真谛去世后，其弟子返还各地传播《摄论》学。《摄论》学遂遍及南北各地，与北方《地论》学并驾齐驱。

南朝除译经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的佛教著述，但大多已散

失。现存而又重要的，有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与《弘明集》、释宝唱的《比丘尼传》、释慧皎的《高僧传》等。

南朝的佛寺梁代最多，有 2846 所，仅建康就有 500 余所。南朝的僧官制度已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僧局或僧省，长官称僧正，副职称都维那或僧正悦众。地方州、郡、县也设置僧正，而副职仅州有时设置。

南朝的儒释道之争比较激烈，尤其是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争论的时间最长，参加的人数最多。这一争论在东晋时即已开始，刘宋初何承天、宗炳等人又反复争论。至齐梁时由范缜把争论推到了高峰。范缜撰写了《神灭论》，主张形尽神灭，而萧子良、梁武帝及其臣下 60 余人都先后攻击范缜之说。最后虽然范缜之说有理，而梁武帝却用权势压制，使争论不了了之。此外，还有夷夏之争与“三破”之争，都是道家和儒家针对佛教的，但争论不激烈。从总的趋势看，南朝时期虽有儒释道三教之争，但主张三教一致的还是占主导地位。

北朝诸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灭佛外，都不同程度的崇信佛教。魏太武帝之灭佛，与信奉天师道的崔浩的关系很大。其灭佛手段也相当残暴。但灭佛不久太武帝就去世，佛教又得到复兴。周武帝之灭佛比较温和谨慎，在灭佛前，就多次召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然后宣布废除佛道二教，僧尼、道士还俗为民，并无杀戮措施。

北朝也有排斥佛教的儒士，如阳固、裴延儒、李场、张普惠、杨衒之、刘昼、章仇子陀等。

北朝佛教，义学不发达，故译经也少。魏宣武帝永平初，才有天竺僧菩提流支等到洛阳译经。菩提流支自永平初至东魏天平间的 20 多年中，共译佛典 39 部 127 卷。与菩提流支同时译经的

还有天竺僧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在他们的译经中,以《十地经论》的影响最大。《十地经论》译出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就分别传授弟子。大概二人对经论的理解不同,说法就有分歧,后来便形成两大派系。菩提流支传授的有道宠,称为北道系;勒那摩提传授的有慧光,称为南道系。因南道系在魏末及齐周隋三朝中担任僧官的人多,故影响最大,实力最强。北朝除盛行《地论》外,还盛行《阿毗昙》。弘传此学者是慧嵩,世人称之为“毗昙孔子”。

北朝盛行禅法,因北朝统治者重视修功德和具体的宗教实践。建寺造像开石窟就是修功德;坐禅诵经就是宗教实践。

北魏影响最大的禅师是天竺的佛陀禅师,于孝文帝时来到北魏。孝文帝为他在嵩山建了少林寺。他的再传弟子僧稠最有名,魏孝明帝曾三次召之入京。北齐时,僧稠也受到文宣帝极高的礼遇,使佛陀一系之禅学盛传于北齐。

达摩禅师在北魏也传授禅法,因未得到统治者重视,影响不如佛陀大。但在民间还是有较大的影响,故后世禅宗史还尊达摩为初祖。

北朝传播的律有《僧祇律》、《十诵律》与《四分律》,后来却以《四分律》为主。弘传《四分律》的以慧光影响最大。慧光撰有《四分律疏》,至唐初仍为僧众所重视。

北朝还盛行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信仰与弥陀净土信仰。弥勒信仰的盛行,可从各种造像中弥勒造像占了很大比例看出。弥陀信仰则由北魏后期的昙鸾所倡导。他受到魏朝廷的崇敬,称之为“神鸾”。他又撰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等著作,对当时和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后世净土宗就尊昙鸾为初祖。北朝观世音信仰的盛行,也可从各种造像中观世音造像之多看出。特别在北魏分裂后,观世音造像剧增以及

《高王观世音》的出现,说明魏末以后观世音信仰更加盛行。

北魏建寺甚多,魏末佛寺已达3万余所,僧尼200万众。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除极少数大寺由国家或权贵供给外,绝大多数寺院主要靠拥有的土地资给。而寺院的土地多由佛图户或避役出家的下层僧侣耕种。佛图户又称寺户,是魏献文帝时由沙门统昙曜奏请朝廷设置的,由罪犯和官奴组成,隶属于寺院。他们除为寺院洒扫劳动外,还要耕种土地向寺院输粟,实为寺院的农奴。北魏除佛图户外,还有僧祇户。僧祇户是每年向州郡僧曹缴60斛僧祇粟的民户(主要是平齐户)。这是僧曹的一大笔收入。

北朝僧官设置较早,魏道武帝皇始中就开始设置,称为道人统。文成帝时改名沙门统,又称为沙门都统。其副职称都维那,始设于孝文帝时。州郡也设有沙门统和都维那,而县只设维那。寺院则由上座、寺主、维那管理。

中央的僧官机构,北魏初称监福曹,后改称昭玄寺。州郡县的机构则称沙门曹。

北朝凿建石窟多处,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